

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与 马丁·布伯德译本之对比探究*

何 俊

提 要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与奥地利—以色列犹太宗教思想家马丁·布伯不约而同地选译了《聊斋志异》,这两位身份迥异的译者,所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在翻译《聊斋志异》上彰显出来的翻译行为、翻译策略和翻译范式上都存在较大区别,尤其是其背后潜藏的翻译动机和旨趣有着明显差异。尽管如此,两个译本“和而不同”,对后世产生了延续至今的巨大影响,成为所在语言世界的经典译本。

关键词 《聊斋志异》翻译 翟理斯 马丁·布伯

DOI:10.15990/j.cnki.cn11-3306/g2.2018.03.01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erbert Gil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aozhai Zhiyi* and its German Translation of Martin Buber

He Jun

Abstract: The British sinologue Herbert Giles and the Austrian-born Jewish religious philosopher Martin Buber both produced a selective translation of *Liaozhai Zhiyi*. The two translators with distinct identities, backgrounds of times, social settings and cultural contexts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each other in aspects of translation behaviors, strategies and paradigm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motivation and target. Nevertheless, the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staying in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have as classic ones a great impact on the respective language community.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Liaozhai Zhiyi*; Herbert Giles; Martin Buber

作为清代短篇小说集大成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彰显出与明代拟话本小说迥然不同的叙事模式和特色,它将内容上的怪异玄妙、情感上的真挚淳朴和语言上的清丽典雅熔于一炉,鞭辟入里地刻画了现实生活,辛辣无情地嘲讽了世间丑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代表之作。早在19世纪中叶,《聊斋志异》就被译成英文而走出国门,成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文科科研项目之青年教师成长项目“以《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为代表的‘短篇小说’文类资源在德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为西方读者的精神盛宴;时至今日,无论是从译入的目标语言还是翻译版本的数量来看,它都名列中国文学名著的首席。早期西方世界对《聊斋志异》之所以生发出如此浓厚的兴趣,除了故事本身从语言到内容上的精彩纷呈以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这部小说集代表的文体类型“短篇故事”在当时的中国发展势头迅猛,可以为西方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①《聊斋志异》集中折射出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社会百态,而且因为精灵鬼怪的云集而充溢着如梦似幻的浪漫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着发祥于德国、继而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成为当时德语文化区翻译最热的中国文学名著之一。就中国文学名著在德语世界的译介次数和发行版本而言,《聊斋志异》稳坐《今古奇观》之后的第二把交椅。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的英文选译本(164篇故事)和奥地利—以色列犹太宗教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的德文选译本《中国鬼怪爱情故事》(16篇故事)都是《聊斋志异》早期颇具代表性的译本,而后者某些篇目的翻译又曾经参照前者。这两位身份迥然不同、来自不同时代和国度的译者,在翻译底本、翻译行为方式、翻译动机和策略、译文语言风格乃至背后潜藏的翻译思想和旨趣上,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这两个译本都堪称所在语言区的经典之作,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译者,其畅销程度从直至今日还在进行的再版即可窥见。

一 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

在译本前言中,翟理斯交代他依据的底本是1842年出版的但明伦评注本^②,而有学者推测它依据的蓝本很有可能就是乾隆三十一年赵起昊“青柯亭”刻本^③。出于对当时社会和文化大背景的顾虑,翟理斯对这部中国古典小说集做了很大程度的“改写”式翻译。

(一) 因时删改的翻译策略

1. 对涉及“不洁”内容的删改

翟理斯在《聊斋志异》时删改原作内容,规避或剔除了原文中涉及血腥、生殖、性事等在他看来“不洁”的内容,这跟他所处的以拘谨肃整文风而著称的整个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及其克制禁欲的清教主义婚恋观息息相关,因此他在向本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时不得不考虑到当时英国读者的接受品位和审美取向。起源于16世纪的清教在英国社会影响根深蒂固,而翟理斯处于清教主义盛行的维多利亚时期,其时公众对性普遍采取压抑态度,避免在公开场合谈及任何与性相关的话题。出于性道德洁癖,翟理斯对《聊斋志异》中涉及青年男女私情媾合之事剔除得一干二净,使其译本“俨然好像一本少儿读

^① 周发祥《中国古典小说西播述略》,《国际汉学》1999年第4辑。

^② Pu Songling,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trans. by Herbert Giles, London: Thos. de la rue & Co., 1880, p. xxiv.

^③ 洪涛《论〈聊斋〉的文化特色和英译本中的归化现象》,张永政主编《聊斋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物”^①，而翟理斯在译本正文前的寄语中也提到“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与孩子们”；就翻译时间而言，翟理斯1877年春担任广东副领事一职之时开始翻译，中途他又调至厦门担任外交职务，1880年完成全部翻译，故而封面上特别注明“在英国女王陛下领事馆任上所作”，一方面自然是对这一工作经历表示纪念，另一方面也暗合着他对当时所处维多利亚时代背景以及为王室效力这一个人身份的顾虑。

另一方面，删改的动机也是出于维护和强调中国文学纯洁性的需要。他在《中国之文明》这本书里声称“高尚的中国文学也是如此，它必须是足够纯洁的，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最正襟危坐的人群。中国诗歌浩如烟海，但是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丝不得体的暗示，任何诡秘的影射或不纯洁的伎俩也无处可寻。”^②但是，他发现中国文学一旦进入市井小说，文学的纯洁性则会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只有读到一些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或逸闻轶事类文章等并非用上流社会文笔写成、因而不被视为正统文学的作品，这时我们才会发现，在这些作品身上，原来的高尚标准并不总是留存下来”^③。

2. 对“异史氏曰”评论的摈弃

在翟理斯翻译的164篇聊斋故事中，除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篇目中都对“异史氏曰”弃之不译。这一方面源于当时英国小说在这一点上的诗学兴盛和自足^④：在18世纪英国小说的发轫阶段，出现了第三人称叙述模式，它的一大特点就是让叙述者成为作品中的一个活跃“人物”，在小说的不同地方，叙述者经常“跳出来”插入自己的议论^⑤，其功能与《聊斋志异》各篇故事末尾的“异史氏曰”大同小异；但在翟理斯译介《聊斋志异》的19世纪下半叶，英国小说总体上摈弃了作者或叙述者在文本中做“插入性评论”的叙事手法，维多利亚小说家中少数人的此类做派受到多数批评家的驳斥^⑥，故而翟理斯对原作故事末尾处的作者评论性文字“异史氏曰”全部删除。由此可见，翟理斯受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遵从当时英国小说的主流叙事模式，对译本进行了从形式到内容上的改写，从而使译本符合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习惯。另一方面，当时作为赞助者的英国出版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期英国读者的阅读喜好和接受取向，“异史氏曰”表达的无外乎是作者对当时中国百姓生活和时政的个人见解，对满足当时英国读者了解故事折射出的中国文化镜像和社会状况无甚助益^⑦。于是，在译入语的自我意识形态占据上风的大前提下，“异史氏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悉数删除。

(二) 翻译中的归化策略

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之时，不平衡的世界格局与中外政治关系使西方文化明显占据强势地位，而中国文化则屈居弱势地位。投射到翻译之上，“向一种强势文化译介当时处于

① 任增强《“媒、讹、化”与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② H. Giles,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1, p. 131.

③ H. Giles,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p. 131.

④ 余苏凌《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的道德和诗学取向》，《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⑤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⑥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第28页。

⑦ 曾娅颖《〈聊斋志异〉聊斋志异》还是《来自一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弱势的文学作品,大部分译者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归化翻译,以使译本更好地为目的语读者接受”^①。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为了使译本遵循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翟理斯在译介《聊斋志异》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归化翻译策略。在同时期学者波尔(John Dyer Ball)诗意充盈的评价中,亦可窥见这一策略:“翟理斯在透彻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将其‘英语化’(‘Englishes’)了……在他的译文里,我们见到的不是一个身着西式服装的中国人,看上去陌异而别扭;相反,这位天才的妙笔一挥而就,文学灵性之轮转动,中国的精神和生命遂投胎转世成为‘欧洲范式的肉身’,语言丝丝入扣,风貌优雅大方”^②。

翟理斯“英语化”的归化翻译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篇名的翻译;二是文化负载词的翻译^③。翟理斯翻译的大部分故事以人名或故事中的主人公为篇名,对这些篇名的处理绝大多数都没有采取直译的方法,而是采取添加“文内注释”的扩充翻译法,抑或根据情节内容重新拟定标题(参见下文表格)。另外,在翻译篇名时,翟理斯会移植西方的一些文化意象来引起读者的认同感。翟理斯在译介《聊斋志异》中的文化负载词时也主要采取了归化翻译策略,用西方特色的文化负载词来替换相应的汉语词汇,比如选用来源于西方文化两大经典著作——《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的名称或习语来译中国文学里固有的现象。而在后来的《聊斋志异》德文译本中,也可以找到翟理斯的翻译技巧和策略的印痕,尤其是文本删减和改写式译^④。正是由于关照当时“西强中弱”的社会文化语境的需要,翟理斯以英语语言的“肉身”和“躯壳”再现中国文学的“精神”和“灵魂”,使自己的译本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而迎合当时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理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的译文符合英语读者的接受习惯,从而达到介绍中华文化之目的:通过觅取与原文中的中国文化镜像形神兼似的西方意象,为英语世界的读者理解《聊斋志异》提供陌异文化的减负。另一方面,经过“英语化”的译文语言,也丰富和扩充了英语叙述具有浓郁东方风情的故事的能力,故而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英语语言本身的表达力。此外,翟理斯在译文中加入了大量注释,使它们构成作为译文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副文本”,彰显了译本的学术价值。^⑤对于原作中插入的某些诗歌,曾翻译过大量汉文古诗词的翟理斯也用忠实而且优美的笔调译出。

(三) 翟译《聊斋志异》的经典化

翟理斯译本对推动《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作用^⑥。这个译本

① 李冰梅《文学翻译新视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3页。

② J. Dyer Ball, “Dr. Giles’ 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a Review*, vol. 25, no. 4 (1901), pp. 207—210.

③ 李海军《从跨文化操纵到文化和合——〈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页、61页。

④ Müller, Eva. Übersetzung und Interpretation: Frühe englische und deutsche Übertragungen des Liaozhai Zhiyi von Pu Songling. In: Buchta, Katrin/Guder, Andreas (Hrsg.) *China, Literatur, Übersetzen: Beiträge eines Symposiums zu Ehren von Ulrich Kautz*.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Lang, 2006, S. 111—130, hier S. 112.

⑤ 孙轶旻《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的注释与译本在接受》,《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2期。

⑥ 李海军、彭劲松《翟理斯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出版后“被转译成好几个国家的文字,在西方代表蒲松龄达一个多世纪之久”^①。后来有不少人从翟理斯的英译本里选录若干故事,编成另外的中国故事集,这充分证明了翟理斯译本的持续生命力与影响力。翟理斯也在自己的其他著作中为《聊斋志异》广做宣传:在《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1)中,翟理斯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介绍,其力度远远超过对李白和杜甫的叙述;翟理斯1882年出版《历史上的中国及其他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一书,书中《朝代述略》部分的第五章《明代》即由他翻译的聊斋故事《金和尚》构成。《聊斋志异》英文选译本与译者翟理斯之间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相互成全”抑或“双赢”的良性互动关系^②:作为异国他乡文学的舶来品,翟理斯的译作在英语世界几乎脱离原作,数百年来以一种近乎遗世独立的姿态岿然屹立,让这部《四库全书》“黜而不载”的文言小说健步如飞地踏上了西行之旅^③;而英译《聊斋志异》的出版又充分成全了翟理斯的美名,为他此后跻身英国三大汉学家之列奠定了坚实基础。^④

二 马丁·布伯的《聊斋志异》德译本

影响较大的早期《聊斋志异》德语译本出自奥地利犹太宗教思想家马丁·布伯之手,1911年由法兰克福一家出版社首印,后来由多家德国及瑞士德语区的出版社多次重印,1991年还有一个英语转译本问世^⑤。布伯译本的一部分篇目由翟理斯的英译转译而成,另一部分则是对当时在柏林大学担任汉语教师的中国人王警涛初译的加工。布伯在译本的前言里也两次提到王警涛的名字,在开头提及自己接触《聊斋志异》“先是通过阅读译文的方式,后来是经由王警涛先生的友好指点”^⑥,在结尾处又写道自己的翻译是“在王先生的帮助下完成”^⑦。布伯德译本的初版和再版都在译文之前附上了译者撰写的“导言”,其中简介了蒲松龄的生平和创作,并将《聊斋自志》的部分内容翻译了出来。导言在欧美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邝如丝(Rose Quong)1946的英译本《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即转录了布伯导言的英译。

(一) 篇名翻译对比研究

布伯的选译本译出16篇故事,对比下表所列布伯的篇名翻译与翟理斯的处理方式,不难发现,二人的翻译策略大同小异:尤其是涉及到由人名构成的篇目,要么用转化策略描述主人公的身份或性格特质,要么是点出全篇主题词或决定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词。

① Pu Songling,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trans. by John Minford,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6, p. xxxii.

② 王燕《翟理斯与英译“聊斋”的相互成全》,《文汇报》2017年1月8日,第7版。

③ 王燕《翟理斯与英译“聊斋”的相互成全》,第7版。

④ 王燕《翟理斯与英译“聊斋”的相互成全》,第7版。

⑤ 这个英文转译本不仅包括布伯翻译的《中国鬼怪爱情故事》,还包括庄子语录和寓言。参见: Martin Buber, *Chinese Tales: Zhuangzi Sayings and Parables and 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 trans. by Alex Page, New Jersey,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91.

⑥ Buber, Martin (übers.). *Chinesische Geister-und Liebesgeschichten*, Frankfurt a. M.: Rütten&Loening, 1928, S. IX.

⑦ Buber (übers.), *Chinesische Geister-und Liebesgeschichten*, S. XV.

篇目中文题名	篇目德文译名	德文题名回译	篇目英文译名	英文题名回译
画壁	Das Wandbild	壁画	The Painted Wall	绘了画的墙壁
陆判	Der Richter	法官	Judge Lu	姓陆的法官
婴宁	Das lachende Mädchen	笑的女孩	Miss Ying-ning; or ,the Laughing Girl	婴宁小姐; 或笑的女孩
莲香	Die Füchsin	母狐狸	Miss Lien-Hsiang ,The Fox-girl	莲香小姐; 或狐狸女孩
阿宝	Die Wege des Liebenden	恋人之路	(Miss A-pao) or Perserverance Rewarded	阿宝小姐; 或毅力的回报
竹青	Die Krähen	鸦	The man who was changed into a Crow	变成乌鸦的男人
香玉	Die Blumenfrauen	花之女	The Flower-nymphs	花之仙女
* 书痴	Der närrische Student	愚笨的学生	X	X
雷曹	Der Gott im Exil	被放逐的神	The Thunder God	雷神
罗刹海市	Das Land im Meer	海中之国	The Lo-cha' s Country and the Sea Market	罗刹国和海市
* 翩翩	Das Blätterkleid	叶衣	X	X
* 巩仙	Der Ärmel des Priesters	神父的袖子	X	X
莲花公主	Der Traum	梦	The Princess Lily	莲花公主
* 宦娘	Musik	音乐	X	X
* 阿绣	Die Schwestern	姐妹	X	X
* 小谢	Wiedergeburt	重生	X	X

根据德国汉学家魏汉茂的研究,《书痴》《翩翩》《巩仙》《宦娘》《阿绣》《小谢》六篇(上表中星号标记)实为王警涛初译,而布伯对其做了大幅度的加工修改^①,但也有可能采取了王警涛口述、布伯记录整理的译述之法^②;其余十篇则由布伯根据翟理斯的英语译本转译而来。然而,王警涛翻译依据的是何种底本,并无交代。

(二) 翻译动机和目的

虽然布伯的《聊斋志异》译本对德语世界的中国文学接受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他翻译的兴趣和出发点不在于文学或者汉学,而是因为其中的怪异和神秘主义以及宗教背景

① Walravens, Hartmut. Martin Buber und Willy Tonn und ihre 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In: *Monumenta Serica*, 1994 (42), S. 465—481.

② Eber, Irene. Einleitung: Chinesische Geister-und Liebesgeschichten. In: Mendes-Flohr, Paul/Witte, Bernd (Hrsg.) *Martin Buber Werkausgabe: Bd. 2/3 Schriften zu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und Literatur*.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01, S. 13—50, hier S. 31.

令他着迷。作为犹太宗教思想家和神学家,布伯对《聊斋志异》的兴趣跟他先前集中精力研究的犹太教哈希德派有着紧密联系^①。布伯在聊斋故事里窥见了鬼神和人类在现世生活中的交会,他称之为“一统”或“同一”,而这种“合一”的观念在道教和哈希德派中都有明显体现。^②无独有偶的是,除了《聊斋志异》,布伯还翻译过其他道教经籍,比如他几乎在同一时期翻译了《庄子语录和寓言》,后来还将《道德经》的一些章节翻译成了希伯来语。尽管布伯在研究哈希德派时关注的是宗教题旨和接近上帝,但他在《聊斋志异》里人与鬼怪的融洽共处中感知到了一些东西,而这些跟他研究的宗教思想并非完全相异。在布伯看来,西方的人文思想打上了“二元对立”的烙印,西方人让世界客观化,这样一来就把人自身与外部世界的万事万物之间硬是人为地区分开来;反之,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里则存在着一种以人鬼共处为表征的和谐安宁、井然有序和生命传承。对此,布伯在《聊斋志异》译本前言里饱含溢美之辞地写道,“自然的秩序在此未被打破,而是得到了扩展:处处充盈着勃勃生机而不会停滞消亡,而一切生命之源都来自鬼怪”^③。在布伯的眼中,不光有生命的动植物可以成为鬼怪,没有生命的物体比如岩石和画壁中间也可以有精魂绽放,它们都想要化身人形或结出果实,并入驻人的生活,但这些并不阴森可怕,因为“这就是家,就是生活”^④。

考察布伯选译的16篇作品,可以看出好几篇的母题皆是凄美绝伦、摄人心魄的人鬼恋,比如《婴宁》《莲香》《阿宝》《阿绣》《小谢》等等。布伯对其中的涉性文字俱都一字一句地全部译出,没有任何删节或改动,因为他在狐鬼神妖身上已看不到什么狐性、鬼性、神性、妖性,只是一种人化了的性情,即人性美、人情味甚至人伦道义。在蒲松龄笔下的世界里,人类和精灵鬼怪在同一世界里共存,布伯称之为“一种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魔力”^⑤。作为宗教思想家、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布伯,他对《聊斋志异》的翻译动机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猎奇求异层面,而是上升到探究中华文化思想根基、尝试着洞悉华夏民族普遍世界观的高度。在布伯看来,中国人思想中的“同一”观念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秩序,它囊括了整个世界及其以外的东西,而人世和鬼界这两个领域并不是互相隔绝的,它们经常会以一种波谲云诡而又从不紊乱的方式交织互动。但是布伯自己的“同一”观念建立在一个迥然不同的根基之上,而且受到他有关犹太人生存“二元论”假设的影响。^⑥在他看来,犹太人永远都在历史和现存的矛盾之间游移摇摆,因此犹太教的创造性动力就在于顺应这些矛盾,并且试着克服“二元论”以实现“一统”。^⑦尽管布伯对中国哲学和文学的短期研究在他的整个著述生涯中只是短暂的一瞥,他对道教元素的融入以及《聊斋志异》故事中神秘思想元素的汲取,却对他自身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哈西德教派的理念更新起到了重

① I. Eber, “Martin Buber and Taoism”, *Monumenta Serica*, vol. 42 (1994), pp. 445—464.

② M. Buber, “Foreword”, in Martin Buber, *Chinese Tales: Zhuangzi Sayings and Parables and 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 trans. by Alex Page, pp. 111—113.

③ Buber (übers.),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S. IX.

④ Buber (übers.),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S. X.

⑤ Buber (übers.),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S. IX.

⑥ Eber, “Martin Buber and Taoism”, p. 453.

⑦ Kohn, Hans. *Martin Buber, sein Werk und seine Zeit, ein Beitrag zur Geistesgeschichte Mitteleuropas, 1880—1930*. Köln: Melzer, 1961, S. 77, 87, 100.

要作用。^①

(三) 悉数直译的翻译策略

比之翟理斯“因时删改”的“改写式”翻译,布伯的翻译在很多时候都呈现出循规蹈矩的“忠译”风貌和范式。这一点在二人都翻译过的《莲香》一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莲香》里的“倾国之姝”被翟理斯译为 a perfect Helen for beauty^②,在这一归化式翻译中虽然可以找到很大程度上的对应之处,但原文并未给出一个具体的人名;相比之下,布伯的直译倒显得更有诗意,所谓 eine Schönheit, die ein Königreich zu stürzen vermochte^③,回译过来便是“一个可以让一座王国倾颓的美人”。有关二人对原文中涉性内容的处理,且看以下示例:

原文:惊问所来,曰“妾莲香,西家妓女。”埠上青楼故多,信之。息烛登床,绸缪甚至。(《莲香》)

翟理斯译文: Asking her whence she came, she replied that her name was Lien-hsiang, and that she lived not very far off, adding that she had long been anxious to make his acquaintance.^④

布伯译文: Er fragtesie, woher sie komme, und sie antwortete, ihr Name sei Lien-hsiang und sie lebe in einem, grünen Haus“(Dirnenhaus) im Westen.^⑤

“妓女”这一色情职业被翟理斯视为“不洁”,故而省略不译,并增加“她一直渴望与他结识”这一原文中没有的信息;而在布伯的笔下,“青楼”先是被直译为“青色的房子”,随即在括号里加注为“妓院”,非常忠实地传达出了原意。

《莲香》中还有一段涉及狎昵的不雅内容,“既而罗襦衿解,俨然处子。女曰‘妾为情缘,葳蕤之质,一朝失守,不嫌鄙陋,愿常侍枕席。房中得毋有人否?’”这段被翟理斯完全略去不译;而在布伯的笔下,这一段文字悉数译出^⑥。而另一段文字关涉嘴喂唾沫等香艳热辣的描写,“问‘何需?’曰‘樱口中一点香唾耳。我一丸进,烦接口而唾之。’李晕生颐颊,俯首转侧而视其履。莲戏曰‘妹所得意惟履耳!’李益惭,俯仰若无所容。莲曰:‘此平时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纳生吻,转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莲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间,腹殷然如雷鸣。复纳一丸,自乃接唇而布以气。生觉丹田火热,精神焕发。莲曰‘愈矣!’”。翟理斯的译文非常简洁,剔除了原文的诸多细致入微的情节描写,读者见到的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医疗过程和结果“Miss Li did as she was told, and put the pills Lien-hsiang gave her one after another into Sang’s mouth. They burnt

^① Friedmann, Maurice. *Begegnung auf dem schmalen Grat. Martin Buber—ein Leben*. Münster: Agenda, 1999, S. 89–90.

^② Pu Songling,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trans. by Herbert Giles, p. 169.

^③ Buber (übers.), *Chinesische Geister-und Liebesgeschichten*, S. 39.

^④ Giles (tran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p. 169.

^⑤ Buber (übers.), *Chinesische Geister-und Liebesgeschichten*, S. 39.

^⑥ 布伯译文为: Dann entkleidete sie sich, und er sah, daß sie eine Jungfrau war. Sie sagte: „Ich will heute aus Liebe zu Ihnen meine Unberührtheit opfern. Wenn Sie mich nicht gering schätzen, werde ich gern Ihren Kissen und Matten dienen.“ Später fragte sie: „Kommt sonst jemand zu Ihnen?“ 参见 Buber (übers.), *Chinesische Geister-und Liebesgeschichten*, S. 40.

his inside like fire; but soon vitality began to return ,and Lien-hsiang cried out , ‘He is cured!’ ”; 而布伯对以上文字的处理则全然不同 ,几乎一字一句地全部译出 ,没有任何删节或改动^①。从以上译文对照不难看出 ,在很大程度上 ,布伯的翻译从翟理斯的译文中解放出来 ,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翻译之路。

布伯“忠译”策略的一个例外就是对作者评论文字的舍弃。在他翻译的 16 篇故事中 ,含有“异史氏曰”评注的有《阿宝》《陆判》《香玉》《雷曹》《莲香》《罗刹海市》《婴宁》《书痴》《巩仙》《翩翩》和《小谢》11 篇 ,而布伯无一例外地省译了点评部分。如果说前七篇略去评论不译是遵循了原译者翟理斯的译法 ,那么后四篇对评注部分的删译恐怕多半要归咎于王警涛在初译时即已舍弃。

(四) 布伯《聊斋志异》选译本的经典化

布伯的译本对德语文化圈产生了巨大影响 ,甫一出版 ,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各大报刊上即涌现出大量书评。黑塞是二十世纪对中国最感兴趣、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最关注的德语作家之一 ,也是布伯的朋友 ,他的书评发表在 1912 年 3 月 25 日的《新苏黎世报》,称赞这个译本是他读过的除《诗经》和《庄子》以外诗意最浓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是布伯多种著译中最美妙有趣的一本^②。为了让德语区读者对这部书有一个更为直观和明晰的概念 ,黑塞还将《聊斋志异》与格林兄弟和德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的童话相提并论。这个译本还引起了德国新古典主义作家保罗·恩斯特(Paul Ernst ,1866—1933) 的注意 ,他在称赞之余还指出“中国古诗已经译成德语供国内读者品鉴 ,但这类独特的故事还是第一次在德国付梓。”^③卡夫卡阅读了布伯译本后赞叹不已 ,在 1913 年 1 月 16 日致友人菲莉斯的信中写道“布伯出版了《中国鬼神爱情故事选》,就我所知 ,这些故事精妙绝伦。”^④ 1912 年 3 月 19 日 ,人智学之父、“以人为本”的华德福教育创办者、奥地利学者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 ,1861—1925) 在柏林演讲时也提及了布伯的这本译作^⑤。1914 年 ,

① 布伯译文为: Li fragte sie , was sie denn hergeben solle , und Lien-hsiang antwortete: „Einen Tropfen Ihres Speichels müssen Sie , wenn Herr Sang die Pillen in seinem Munde hat , ihm mit Ihren Lippen darreichen.“ Lis Wangen färbten sich mit tiefem Rot , sie neigte den Kopf , sah erst zur Seite , dann auf ihre Schuhe. Lien-hsiang sagte: „Ihre Gedanken haften wohl an Ihren Schuher?“ Lis Scham wurde noch größer , und sie wußte nicht , was sie beginnen sollte. „Das ist doch eine Kunst , die Sie oft geübt haben“, sagte jene wieder , „warum sie jetzt versagen?“ Endlich fügte sich Li widerstrebend in ihren Willen und tat mal um mal , was ihr befohlen war. Als Sang die Pillen geschluckt hatte , entstand ein Gewitter in seinem Leibe und als Lien-hsiang nun auch ihren Mund an seinen legte und ihm ihren Atem einflößte , fühlte er es in sich wie eine Feuersbrunst. Dann aber fand er sich mit einem Male gestärkt und voll neuen Lebens , und Lien-hsiang rief: „Er ist geheilt.“ 参见 Buber (übers.) , *Chinesische Geister-und Liebesgeschichten* , S. 49—50.

② [瑞士]赫尔曼·黑塞著 , [德]孚克·米歇尔斯编选 , 谢莹莹译《黑塞之中国》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 , 第 125 页。

③ Ernst , Paul. Chinesische Geister-und Liebesgeschichten. In: *Das Literarische Echo* , 1. September 1912 , S. 1668 f.

④ [奥]弗兰茨·卡夫卡著 , 叶廷芳编译《卡夫卡全集》第 9 卷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216 页。

⑤ Steiner , Rudolf. *Der irdische und der kosmische Mensch. Ein Zyklus von neun Vorträgen* , Berlin , 23. 10. 1911 und 19. 03. —20. 06. 1912. [http://anthroposophie.byu.edu/vortraege/133.pdf , 19. 05. 2015]

同为童话作家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 根据布伯选译本中的《梦》(即《莲花公主》) 改编了一部芭蕾舞剧《蜜蜂》, 但对原作的改动较大。《莲花公主》突出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 而《蜜蜂》展示的是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①该剧于1916年在德国首演, 曾在欧洲引起轰动。德语区学术文化圈尤其是众位文化名人对布伯《聊斋志异》译本的称赞与褒奖, 有力推动了它在德语世界作为经典译本的接受和传播进程。

三 结语

汉学家出身的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是出自对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 以及向英国读者介绍这部作品彰显的中国文化特质的意愿。他身处道德教化律条严苛的维多利亚时代, 在翻译时不得不“因时而动”, 在性道德洁癖的驱使下, 删除或篡改了诸多在他看来不符合中国文学“纯洁性”的故事情节。他在译文中穿插了大量的脚注, 并采用高度归化的翻译策略, 让译文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英语化”, 至于在翻译时忽略原作故事末尾处的作者评论性文字“异史氏曰”, 则是因为当时英国小说已经摒弃了这种在文本中植入“穿插性评论”的写作手法和技巧。翟理斯在后来的著作中也不遗余力地推介和宣传《聊斋志异》, 而后来的诸多中国古诗文集也编选了翟理斯译本的篇目, 以该译本为底本的其他语言转译也涌现出来, 这一切都推动了翟译《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相比之下, 作为犹太宗教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晚生代布伯, 他关注并翻译《聊斋志异》则不是出于对汉学乃至文学的兴趣, 而是因为窥见了这部中国名著中暗含的、不同于西方“二元论”根基的、“天人合一”的宗教思想元素, 而这种“一统”又投合着他集中精力研究的犹太教哈希德派的教义精神。就翻译行为方式而言, 一方面不谙汉语的布伯立足翟理斯的英译本, 转译了几篇切合着他关注的“人鬼情未了”旨趣的故事; 另一方面他幸得当时在德国任教的中文讲师王警涛的襄助, 于是二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初译后加工的合作, 也有可能发生了类似于林纾式的“译述”活动。就译文的语言层面而言, 布伯对其中的涉性文字毫无删改地悉数译出, 因为他在狐鬼神妖身上洞彻的只是至真至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美, 除了原文结尾“异史氏曰”的评注文字之外, 布伯对包括穿插在文本中的诗词在内的全文都忠实译出。尽管这两位译者及其译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 但作为早期英语和德语世界的经典译本, 它们“和而不同”、殊途同归, 对后世都产生了持续至今的巨大影响。

作者简介: 何俊(1979—), 男, 湖北武汉人, 文学博士,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

^① 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第323页。